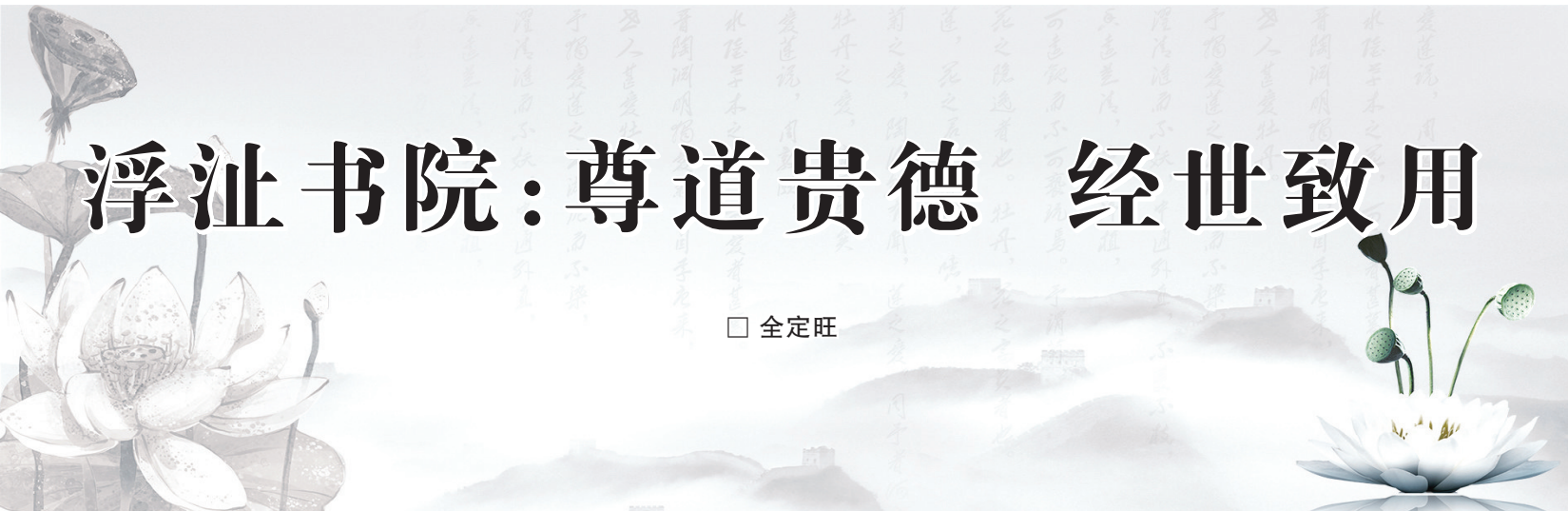




浮沚书院：尊道贵德 经世致用

□ 全定旺

浮沚书院是温州历史上一所影响深远的书院，坐落于市区松台山麓，原为北宋周行己的故居和讲学之地。书院选址于“净光山下，古西射堂之遗址，葺然小洲，缭以勾水”，行己将其取名“浮沚”，意为身若浮萍，去留无止，愿以无止之身而处暂寓之室。在这山水环绕、清幽静僻的“暂寓之室”，行己开始收徒讲学、传授知识，在当时“见闻最晚”的永嘉（今温州），“邦人始知有伊洛之学”。

（一）

中国书院的制度与精神，奠定于两宋时期，钱穆先生认为宋学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北宋书院大体有三类：一为地方官员出面，公众筹资，在前代书院基础上重建的官学延伸式书院，如石鼓书院；二为大宗族自建的家塾式书院，如华林书院；三为学者自设授学的私塾式书院，浮沚书院便为此类。

北宋初期的书院以前两类为主，如名重一时的宋初四大书院大都是官学延伸式书院。宋初，朝廷为了征服割据政权，消耗了大量财力，除了国子监、太学外，州县乡之学基本处于停滞状态。但此时百废待兴，官学教育与社会对于人才的大量需求脱节，这种状态为书院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使书院成为代替官学的重要存在。

北宋三次兴学，重在加强官学教育。虽说一时成就可观，然均以失败告终。同一时期，在官学之外，浮沚书院等一批注重讲学和研究私塾式书院兴盛起来。

（二）

周行己（1067—1125年），字恭叔，世称浮沚先生，祖籍瑞安县，著有《浮沚集》等。他自幼好读书，七岁诵经书，十余岁学属文。十四岁其家迁往郡城永嘉，十五岁随父宦游京师。十七岁补太学诸生，与许景衡、刘安节等并称永嘉“元丰太学九先生”。居太学期间，行己从学于陆佃、龚原“新学”，后改从太学博士吕大临“关学”，元祐五年（1090年）赴洛阳师事程颐，成为程门著名弟子。元祐六年登进



图为周行己故居

士第，官至太学博士。大观三年（1109年），行己罢职后回乡授学，创建浮沚书院。

周行己学问历经数次转向，由荆公新学转向关学、洛学，丰富的学问经历让行己既秉持包容的治学态度，又善于从所学内容中进行取舍，形成自己独特的学术体系，从而在浮沚书院讲学中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

尊道贵德，摒弃虚浮之风。周行己早年一心学习科举时文，至二十二三岁时“读书益见道理”，始知“圣人作书遗后世，在学而行之，非以为文也”。于是行己日学而夜思，以学行修明为世人称道，在程门时“持身严苦，块坐一室，未尝窥牖”，保持一贯的修身之态。在书院授业中，行己确立了“知道”的为学宗旨，他说：“博于古今而不知道，谓之多闻可也，而不可谓之善学；善于辞章而不知道，谓之能文可也，而不可谓之善学。”行己努力避免“学之为士者，不知学之本”的状况，教导学生“明吾之善以诚吾之身”，不以学文、应举影响自己对于“道”的追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所以教学也”，行己以孔子之言道明“教学”之义，以身为范，“早晚思古人之修德立行”。

兼收并蓄，不立门户之见。周行己早年在接受洛学的同时，也受到关学、新学的影响，他将新学之代表龚原与程颐、吕大临并称为“能传古道”之人。同时，行己也抛开党派之争，表现出对蜀学领袖苏

轼的欣赏，四库馆臣评论其学问虽出程氏，“而绝不立洛、蜀门户之见”。在书院的教学中，行己也体现出不拘泥于一家之学的包容精神，虽为洛学门生，却在传授洛学“涵泳义理”之学脉的同时，又倡导关学“学以致用”之学风，在讲授洛学“理”为万物本源的思想时，又杂糅关学的“气”说进行讲解。

经世致用，推崇真才实学。周行己对实际问题颇为关注，他强调学“病乎无实，不病乎无名”，“士之学道，亦欲兼济于时”，认为学者在修身之外，也应有兼济天下的情怀和经世致用的才能。行己本人曾在《上皇帝书》中针对国家财政困难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这种对于务实精神的追求，亦表现在他对于人才培养和选贤制度的观点上。北宋时期内有太学，外有郡县之学，但朝廷仍患人才之难，周行己认为这正是由于“养之之道有所未至”“取之之法有所未尽”。为此，行己主张改革养士、取士之法，培养德才兼备、博学多能之人，在选贤方面提出应注重对学生实务能力的考察。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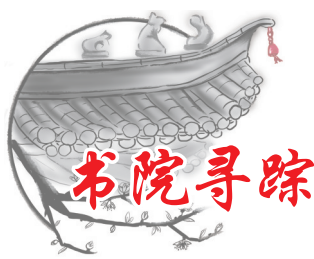
周行己在浮沚书院的教学中将“尊道贵德”置于首位，体现了儒家的人文精神。儒家士人对“道”的追求分为两个互相关联的层面：其一，以“道”修身，完善自身人格，实现“格物、致知、诚意、正

心、修身”；其二，以“道”治世，实现全社会的完善，即“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道”的追求是超越个体的身份、地位本身的。浮沚书院作为兴起于民间而以讲学和研究为主的书院，继承了儒家早期“有教无类”和以道德育人的理念，强调人人皆应受道德洗礼，这种平民化的教育精神，展现了儒家式的人文关怀。

浮沚书院亦成为当时关洛之学在永嘉传播的重要场所，为浙东学术之繁盛奠定坚实基础。永嘉虽于东晋太宁元年置郡，但在北宋时期，依然是“僻远下州”。以周行己为代表的永嘉士人利用各种机会跨越地理障碍，去接触、聆听关洛之学，通过创办书院，将这些主流的思想传播至永嘉各地，成为学术中心对学术边缘发生作用的媒介。

浮沚书院培养了许多杰出人才，造就了永嘉学风的繁盛之景。在永嘉之学的传承中，周行己作为继王开祖之后，真正奠定其学派规模者，为后来的诸多学者提供了思想指引。南宋郑伯熊、郑伯英兄弟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扬了周行己的学术思想，传洛学亦兼传关学，经陈傅良、叶适等人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与理学、心学鼎足而立的永嘉学派。

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认为，永嘉之学“周作于前而郑承于后”“薛经其始而陈纬其终”，学派既保留了洛学“必就省以御物欲”的心性修养之面向，又发展出“弥纶以通世变”的经世致用之精神。永嘉学派的“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的治学态度，实际上可以从周行己的求学、传道经历开始追溯。行己之学“启蒙于皇佑，受业于关洛，传播于永嘉，鼎盛于陈叶”，浮沚书院不仅成为其个人学术思想向外拓展的阵地，也成为永嘉学派精神最初的发源地之一。



《道德经》中的四条人生智慧

□ 刘丽丽

《道德经》九九八十一章，可理解为《道经》（上篇）和《德经》（下篇）两个部分，言简意赅、博大精深。大至宇宙、小至微尘，大无其外，小无其内；有修身、用人、治国。《道德经》之妙在于用，它可传、可行、可证、可悟。《道德经》的魅力在于它穿越了历史的烟尘，在不同的时空里散发出令人炫目的光辉，使人常读常新，能够不断给人的心灵带来启示和震撼。就每一个人来说，究竟从《道德经》中汲取什么智慧呢？则因人、因地、因时、因事制宜。

弘扬“道法自然”的思想与理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就是从更高维度告知、启示我们：要敬天敬地，对“地”“天”始终保持敬畏、感恩，要效法弘扬大地和上天的精神与品格，要厚德载物，做人要厚道；要自强不息，像天体那样，持续不断地运动、努力、进取；要敬畏天道，做人做事遵循天理、良知，因为人在做、天在看，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这九个字都做到位了，即“道法自然”。

培育“上善若水”的境界与美德。老子从九个层面：即善地、善渊、善仁、善信、善治、善能、善时、善清、善胜，论述了“上善若水”。最高的智慧和品德就像水一样，“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像水一样自觉自愿地到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到他人不愿意去的恶劣环境之中去；心胸像深水一样静水流深，宁静致远、善于沉淀；待人像水一样仁爱、平等、真诚，滋养万物一样；行动像水一样机智，顺势而为、该动则动、该静则静。

汲取“无为而治”的哲学智慧。老子学说的精髓，是他的辩证法思想。“道常无为而无不为”。“道”“自然”“无为”这三个关键

词，构成了老子的思想体系。所谓“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道”即是规律，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万事万物存在与变化的普遍原则和根本规律。所谓“自然”，是一种不同于人为而又高于人为的状态，是按照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运行规则而生长、兴衰，达到生命的最佳状态，表达了对人与自然、人与人生之间和谐关系的憧憬。所谓“无为”，王弼的注解是“有为之所失，故无为乃无所不为也”，就是顺应自然规律的积极有为的思想。“无为”是运用矛盾双方的转化规律而提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后人治国、齐家、平天下多用之。对于个体而言，它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则是一种达至善治的智慧。

培养“慎终如始”的精神与作风。从“豫兮”“犹兮”到“慎终如始”，《道德经》告诫人们，做人做事要谨慎小心，像冬天走在冰面上一样，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步也不能松懈；要恭敬郑重，像赴

宴作客一样，讲礼节、有分寸；要居安思危，像防备着敌国的进攻一样，“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把灾难、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要和蔼可亲，像春天的阳光一样温暖，让他人心里的坚冰缓缓消融；要敦厚朴实，像未加雕饰的玉料一样，返璞归真、诚实厚道；要虚怀若谷，像高山幽谷一样，容纳百川，气吞山河，能容人、容事、容言，善于凝心聚力；要顺“道”而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脚踏实地、循序渐进，不急功近利、不盲目冒进；要慎终如始，不居功、不自傲，不固执、不妥为。



2020 年是我国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也是农业农村事业承上启下继往开来之年。为保障广大农村地区在乡村振兴以及农业现代化中顺利前行，我们急需大量农业农村现代化领域高层次创新型人才。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农村人才体系建设，人才队伍数量不断增加，我国农业现代化人才队伍基础已初步形成。但是，在人才队伍结构、高层次人才队伍深度、高校农业专业生源及培养体系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急需着力加以完善。具体来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储备深度有待加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农业农村发展之路，完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减贫工程，农村扶贫治理模式从“救济式扶贫”转向“开发式扶贫”，通过培养现代农业产业技术和产业人才，从向农村贫困地区输血转向带动贫困地区造血。尤其是在过去五年的精准扶贫期间，大量基层管理人才深入贫困地区一线，确保了脱贫攻坚任务的按时完成。但是，随着乡村振兴步伐的加快，农村人才需求也将从数量性需求转向质量性需求，从传统的技能型人才转向综合性、创新性的高层次农村基层管理人才。尽管我们的农业农村人才队伍数量上已初具规模，但是其中真正具有创新意识、创新素质和能力，能够从事创新活动，对国家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做出突出性成绩的人才储备还是略显不足。

从农业大国到农业强国，要求我们的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尽快完成从大到强的迈进。要厘清农业农村高层次人才人才深入培育与实践创新的路径与脉络，吸纳符合农业农村发展的新机制、新模式和新业态。一方面，高层次人才人才培育活动机制的实质在于创新驱动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模式在于引导高校高层次人才科教服务万村常态化，下沉基层常态化，探索形成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国家战略层面的科技成果转化新业态，本质在于培育并赋予服务创新精神新动能。另一方面，构建农科教协同培育机制，突破单一的科研型、技术型人才教育理念，注重培育商业型农业岗位分化人才，优化特定时期高层次人才人才创新思维意识、技能素质和人才能力，以模式集成、机制创新、业态发展顺应农业农村高层次人才创新人才队伍培育的需求。

高等院校涉农专业人才培养应紧密保持与现实社会需求的同步和协同。一段时期以来，涉农专业领域是青年学生报考和就业的冷门。农业产业本身的价值与吸引力是不应被低估的。培育农业农村高层次人才队伍，首先要引导广大青年建立正确的农业农村观，要让全社会重新认识农业产业和农村地区未来发展的潜力和上升空间，要让农业成为吸引广大年轻人的高大上的阳光产业。我国长期重视高等农业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高等教育培养体系。从各地区的农业大学到综合性大学的农业管理专业，每年培养包括本科、硕士、博士在内的近 20 万涉农领域人才。但在实践中，一些农业专业学生毕业后还不能很好地满足行业与基层的需求。农业作为一个具有较强专业性行业应用性的领域，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必须紧密保持与现实社会需求的同步和协同，要让青年人在学农之后能够学以致用，能够在农业领域实现自身人生价值。

建立贯通农业经济管理、农业技术、农业科技的“大农业”综合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大农业”教育理念。与其他行业领域不同的是，农业涉农领域各专业跨度较大，各个涉农学科之间联系较少。比如，农业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缺

加强农业农村高层次人才队伍培育

□ 吕捷

少农作物生长等农学知识，而农学专业学生对经济管理等社会科学知识缺少必要的掌握。此外，随着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新业态的兴起，对农业农村现代化人才的需求层次将越来越高，对农村基层管理人才的知识储备越来越多元化。这就要求传统农业学科培养体系在现有基础上进行跨学科、跨专业升级，构建相互贯通的课程设计和实训体系，加强不同专业知识的交叉融合，打通涉农学科不同专业之间的壁垒。大力培育多元师资队伍，包括对市场和农业生产经验、公共服务和政策法规具有深刻领悟的政府、行业、企业人士。形成产教研产结合的多元化创新格局，以涉农企业、政府、高校等载体为依托，合力开发农业农村高层次人才培育方案。由传统的课堂课程教学以实践等形式拓展到农业类政府主管部门服务、管理一线、农田、农业合作社、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以模块化教学提高高层次人才培育的参与度及“生态式教育”，统筹人才培育方式的整体性及融合性，打通校内外双环节资源，实现人才队伍结构、高层次人才队伍深度、高校培养体系等多方面共赢。

培育具有国际视野、关注国际农业领域发展进程的农业农村高层次人才。农业农村高层次人才的培育应充分遵循全面性、特殊性和实践性的要求。全面性是指对农业农村高层次人才的培育应系统思考，对国际农业领域具有高度敏感性，农业农村高层次人才的培育不应该拘泥于象牙塔内闭门造车，应当与时俱进，顺应中国农业经济发展需要和全球农业发展态势。特殊性是指应秉承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特色，精准对接人才发展需求，与全球农业顶层设计发展趋势精准对接，合理定位人才培育标准。实践性是指应优化配置国际农业领域发展进程的培育实践资源，补齐短板，激发农业农村高层次人才培育的生命力与活力。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党委书记）

